

## 中國古代文字紀錄的遺產\*

錢存訓著 周寧森譯

(一) 引言

人類的歷史，大部份多賴文字紀錄的流傳，得以保存迄今。中國人對於文字記錄的方式，以及用文字作為文化傳播的工具，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遠在第八世紀初年，中國人便發明了雕板印刷術，活字版的應用，亦比歐洲的谷騰堡（John Gutenberg）早四百年。<sup>1</sup> 不僅公認為「文明之母」的印刷術起源於中國，即在印刷術發明以前，中國在文字紀錄發展史上，就已有不少輝煌的成就。譬如：遠在古代，一些世界上其他民族所罕用的材料，像竹簡與縑帛，只有中國人用以書寫。其他如獸骨、青銅、石版等，雖亦曾為其他文化的民族所採用；但在中國，卻使用得更普遍，也更精巧。紙是中國文房四寶之一，至今仍是最流行的書寫材料。用植物纖維所造的紙，於公元前後發明於中國，然後逐漸流傳廣被於全世界。這個發明，已被公認為對人類文化進步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尤其中國紙質的歷久不變，更為近代一般木漿造紙所不及。毛筆和墨，在中國很早就被視為基本的書寫工具。毛筆不僅影響了中國文字的風格，更創造了「書法」；正如繪畫一般，書法也成為中國傑出的藝術之一。至於中國墨汁的優良特質，尤其光澤和持久，更為一般西方學者所稱頌。一位研究製墨歷史的專家說：「中國產品的優良，絕非西方所可比擬，歐洲的藝術家誤認其為『印度墨汁』，使用了許多世紀，直至如今，仍無他物可以比擬。」<sup>2</sup>

\*按此文譯自 Tsuen-Hsuein Tsie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之第一章，原作者對譯文辭句及附注均略有增刪，與原文稍有出入，並此附識。譯者

<sup>1</sup> Thomas Francis Carta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2nd. ed. rev. by L. C. Goodrich (N. Y., Ronald, 1955), pp. 41, 212;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第一、二章；李書華：中國印刷起源，第四、十三章。

<sup>2</sup> Frank B. Wiborg, *Printing Ink: A History with a Treatise on Western Methods of Manufacture and Use* (N.Y., Harper, 1926), p. 2.

中國人很早便致力於文字的機械複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浮雕的陽文印章及字范的應用，已顯示出這種努力於代替手抄複本的趨向。在紙與墨的質量改進之後，印刷術發明幾世紀之前，由紙墨拓印碑文的技術已很發達。這種拓本技術，很近似雕板印刷，因此促進了文字大量複印的可能性。

中國文字紀錄的一個重大的特點，便是它的獨一持久性。這一特點使得一個有創造性的遠古文化，得以繼續延綿至今。中國文字除一般文字通有的音、義以外，還有其特殊的形體，這種特殊形體的文字，超越了時間上的變化，和空間上的限制，團結了中華民族，造成了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文化整體。中國文字的繼續使用，使它成為現在世界上唯一仍舊存在的活的文字。三千年前所通行的一種書寫符號，仍然可以作為今天的文化交通媒介；它不僅保存了中國人的理想與抱負，紀錄了歷史上的盛衰與興亡，更使得這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能得長存於天壤之間。因此，現代生活及社會上的許多現象，從口頭上的成語，到一般禮俗習慣，以至政教制度，常可追根溯源，有跡可尋。譬如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甚至目前用現代技術印刷的書籍，仍有採用狹直的行格，印書者以為在行格之間加用黑線，是為了美觀，而不知這種習慣，乃是根源於古代的竹簡與木牘的形制而來。這個悠長的中國文化傳統之形成，主要是因為自古以來繼續不斷地採用古代的經典作為基本教材的結果；同時，千百年來，士子只有鑽研古聖先賢的著述，才能平步青雲，在社會上飛黃騰達。

中國文字不僅中國人在使用，東亞許多其他民族，雖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但也採用中國文字作為他們文字的一部份。當它們與中國文化接觸之初，中文書籍便流傳至其國內，如越南、韓國、日本及琉球，中國文字的應用於書寫和書籍，都有一段很長的歷史。直到如今，中國的方塊字仍被採用作某些外國文字的一部份。

中國古代的著述，無論質或量，都有很輝煌的成就，已為許多國際學者所公認。中國古典文學，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品。以數量來說，直至十五世紀末年，中國書籍比世界上各國書籍的總數還要多。<sup>8</sup> 即在遠古時期，中國便已產生大量不同種類的書籍。公

<sup>8</sup> 西方學者如 Herbert Giles 及 Kenneth Latourette，雖謂直至十七或十八世紀中國著作的數量，比世界上全部書籍的產量的總和還要多，但據作者估計，在十五世紀末，中國書籍的總數，應比西方各國為多。但自一五〇〇以後，因西洋印刷術的發明，尤其德國，書籍產量大增，中國書籍的數量便逐漸落後了。

元前一世紀左右，已有一種精細的分類制度，將書籍分爲七大類。公元三世紀所制定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在五世紀定型爲經、史、子、集四大類，曾爲中國目錄學家沿用了一千五百餘年，至今仍爲編製古典目錄者所遵循。佛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將人類知識歸納爲歷史、詩歌、和哲理的三分法，是現在西方各種分類法的基石；除了經部以外，其他和中國的類目性質完全相同。由於培根對中國文化的景仰，他很可能受到這四部分類法的影響。<sup>4</sup>

中國古代的典籍在質與量方面的發展，顯示出古代中國在文字傳播和學術研究上的輝煌成就。這是中國文化的基石。如果要瞭解中國文化的起源及發展，大部分便得從瞭解這些古籍中去探索。換言之，要瞭解中國書籍的製作、保存、傳播和散佚，更需要從當時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背景中去研討。

## （二）貞卜文字

中國古代的文字，不僅是人與人之間交通的憑藉，也是人與鬼神之間交通的媒介。前者可說是橫面的交通，後者可說是直線的交通。中國文字在初期發展中，後者的份量也許更勝過前者。我們知道，古代甲骨文字，是殷人占卜和祭祀時的一種紀錄。殷代是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農業社會。宗教信仰，是殷人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天、地、鬼、神，俱爲人所膜拜。尤其是祖先的庇蔭與預兆，更爲其子孫所祈求。認爲奢侈的葬儀，豐厚的陪葬，及不斷的祭祀，能討祖先的歡心，因而得到更多的蔭祐。

殷人將文字紀錄應用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作爲人鬼之間交通的橋樑。祭祀時，用文字昭告鬼神來享受奉獻。祈禱時，也用文字來表達願望。這顯然和西洋文化中用口禱或默禱者不同。占卜時，貞人常將所貞問的事刻在龜甲或牛骨上，有時並將應驗的事，續刻在所卜問的事件之後。因此，殷人當時的卜祭和生活紀錄，乃得以保存。

周代繼殷之後，龜甲仍然繼續作占卜之用，不過卜辭則另書於竹帛，而繫於龜甲之上。著草亦會用以占卜，其辭見於易經。

<sup>4</sup> T. H. Tsien, "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Library Quarterly*, XXII (1952), p. 308.

周代遺留下來的銘文，大多保存在青銅器上。這些銘文中，常有受祭祖先及作器人的名字。他們所祈求的是祖先的蔭祐、子孫繁衍、長樂永康。銘文之所以刻在堅固的金石上，是深恐其他的材料會腐朽消蝕，不能永久存在，因而子孫便不能得到長遠的保祐。墨子說：「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或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sup>5</sup>

祝禱文字有時也刻在石碑或玉版上；公元前四世紀的詛楚文，便是石刻的祭文，詛告於秦代所祭祀的三河水神。至於竹木簡策，本為人與人之間交通的工具；但有時亦作為祭祀時的用品。甲骨文中，有作為當時書籍的「冊」字，象徵着一捆竹簡。它有時加一「示」旁，便有用作祭祀的意義。甲骨文中「工典」一辭，便是貢獻典冊於神主之前，而舉行祭祀的意思。至於封建諸侯之間的盟約，通常要奉祀於神靈之前，以為保證。盟約通常有三份；載有背約者願神殛之的字樣。其中一份，便埋在盟約之地，獻於神靈之前。

縑帛，和簡策一樣，原是書寫工具。但先秦諸子中，常述及帛書也用於祭祀鬼神。當紙在公元前後發明之後，不久即被採用為葬儀中的廉價代替品。為鬼神焚化紙幣（冥寶）的風俗，至今仍在盛行。古時，人們設想鬼神都是識字的，是以在祭祀中，以文字代替口頭禱告。這種廣泛的將文字應用於人鬼交通，也是使古代文字紀錄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三) 官書與檔案

周代封建制度的發展，使得王室與諸侯大量使用文告，並建立檔案制度。此時期中，由於天子、諸侯、百姓、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聯繫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文書的數量。春秋時，諸侯之間的關係，更增加了法定文件的重要性。至於禮節在政治及社會上的地位，也增加了儀禮及史書的價值。甚至日常生活的細節，亦常載入文字紀錄。

天子與諸侯，以及諸侯之間的契約關係，必須明文記載，方能有效。諸侯分封，也都賜以食邑、奴隸、財產、書籍和史官。諸侯對天子，則有臣服、納貢、忠諫、以及軍

<sup>5</sup> 墨子卷四。

事上支援的責任。如諸侯瀆職，得受制裁。左傳：「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可見典籍紀錄以及掌管典籍的史官，也是封賜之一種。至於諸侯會盟，決議也著於文字。若有爭論，則訴之盟府。公元前六三四年，齊孝公侵魯，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sup>6</sup> 所謂盟府，乃是當時的一種外交檔案。有時，這些記載和盟約，則銘刻於銅器之上，世代永存。譬如，公元前九世紀的一個銅盤上，曾鐫有勘定矢散二國邊界的一個三百五十字的盟約。其他很多金文，也都有此類法律性的紀錄。

諸侯間頻繁的往來，便產生了無數的外交文件。左傳中記載着從公元前七二二年到七〇三年間的廿年的史實。其中有五十次會盟，四十次攻伐，三十五次朝覲及出使，十六個盟約，以及其他很多交往的紀錄。這些都是當時各種史實的記載。

諸侯和朝廷中的公牘，如征伐、委任、褒揚、廷告等也佔很大的數量。戰時徵兵令亦書於簡策之上。戰績和俘獲，不但書之竹帛，更琢之盤盂，刻勒碑石，以為永久紀念。臣屬朝見天子，輒書於笏。古笏係玉、象牙或竹所製。朝覲時摺於腰帶之間。朝廷的冊命文告，通常也書寫於簡策。古代流傳下來的書籍中，完善地保存着這種種活動的記載。甚至許多瑣碎的小事，也常常留存；像周公對其兄弟的一個要求，也有記載。一位西方學者說：「這樣一個請求，也記載下來，實在不可思議……我們不得不說周人喜歡寫作。」<sup>7</sup>

#### (四) 史官的職權

孔子之前的知識份子大多是貴族，一切書籍，都是由他們寫作、使用、和保管。這些士大夫階層到底佔人口百份率若干，如今已不可考。所能知道的是人數大概不少。因為當時所有的貴族，都必須先受誦讀與寫作的訓練。貴族教育子弟，是為了要造就服務

<sup>6</sup> 左傳成公十二年；又見僖公二十五年，昭公六年。

<sup>7</sup> H.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N. Y., Day, 1937), pp. 254-5, 論尚書君奭。

於政府機構的人才。論語：「學而優則仕」，指明了教育和行政的關係。至於教材，除了射、御等科目外，大部份是古代的典籍。國語中記載，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楚太子箴（恭王名）所習的課目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等古籍。教育完成之後，學生便可入仕政府。

有關文字記錄的史官，通稱為「史」<sup>8</sup>。史字從又持中，象徵着右手持物，常見於甲骨文及金文。這右手所持之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或說是簡策，或說是盛策之器。但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此物必然與文字記錄有關。王國維說「史」是專門保管、研究及寫作的官吏。<sup>8</sup> 在金文及古籍中，「史」的意義似乎是指各種和文字記錄有關的官吏。「太史」是文案的高級掌管人，他的地位和一般大臣相當。一般的「史」，我們可稱之為書記，他們在政府各機構中，充當記錄、寫作、或是檔案保管一類工作。史官的另一個名稱是「作冊」，他們受僱於諸侯，負責起草冊命和記錄。

史官或書記的主要工作大概是記錄朝廷上的重要事件，王公或太子們的言行，和政府各機構的種種活動。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個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這就是說，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寫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換句話說，「史」是經過一種專業訓練，專門從事著述、抄錄、閱讀、及保管官書和檔案的人。

史官的職位是世襲的。世襲此職的家族，通常有一個與書籍或記錄保管等相關的氏名。歷史上和現代很多的姓氏諸如：簡、籍、史、董等大約都與這種職業有關。左傳記載公元前五二六年，晉國有一個史官的後人名叫籍談，被譏以不知自己家庭的歷史。周景王說：「『且昔而高祖孫伯繫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祖。』」<sup>9</sup>是說他雖然繼承了祖先的姓氏，但沒有承襲這種傳統的工作。

史官在古代政府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有掌管政府文件檔案的權威。史官既是文告的起草人，而這些文字對統治者及封建諸侯都關係非淺；為了確保文字中沒有中傷的言論，不僅選擇最可信任的人充任史官，並且派他們到諸侯各國去掌管各種典

<sup>8</sup> 王國維釋史，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卷六。

<sup>9</sup>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籍，也許還給天子遞送情報。前面提及，左傳記載周人克殷之後，魯公被封為諸侯，授予很多賞賜，其中便有典籍及史官。

一國典籍的遷移，及史官逃亡他國的事實，更進一步地說明了政府檔案的重要性。左傳記載，公元前五一七年，晉國軍隊逐走了東周的王子，于是王子朝和他的親信乃「奉周之典籍以奔楚。」<sup>10</sup>太史公司馬遷也說他的祖先曾世襲掌管周室的典籍，公元前七世紀中葉「司馬氏去周適晉。」<sup>11</sup>

另一個史實，不僅說明國家典籍的重要性，且證明檔案保管者的權力，他們有時會帶着文件逃亡。呂氏春秋說：「夏太史令終古出圖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sup>12</sup>一切歷史記載，都偏袒史官，而斥責統治者。這種逃亡大概是出賣情報，特別是在朝代交替，或朝綱式微時期，更顯出這些典籍在統治者爭權奪位中的重要性，有時且促使舊朝廷的削弱和傾覆。

### （五） 私家著述和藏書

公元前五世紀末年，中國歷史上開始了一個新紀元，政治、社會、經濟上都有了重大變化，這便是戰國時代。由於土地制度及其他各種改革，封建制度逐漸解體。平民開始接受教育，而進入政府工作。因此社會地位的變遷乃日漸加劇，貴族階級無法繼續壟斷教育。孔子說：「有教無類。」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私人講學，並接受平民子弟來從遊的人；也是中國教育普及化的先驅者。

社會經濟制度的變更和教育的普及，促進了知識的廣佈。在這時期中，各種哲學理論及科學思想的興起，形成了此後二千年間中國的傳統文化。後來的史家，根據各種思想的特質，把這些不同的學說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家和農家。這些不同的學派，據說是起源於周朝的王官。雖然現代學者懷疑此種說法，但無論如

<sup>10</sup>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sup>11</sup> 史記卷一三〇自序。

<sup>12</sup> 呂氏春秋卷十六。

何，這些民間學者在哲學、科學及文學上的崛起，正說明了知識已由貴族專有而普及於平民。

一般認為在孔子以前的著述都是官方文件，或是不署撰述人名氏的集體寫作，沒有私人的著述。現存先秦諸子及史料中，找不到一點關於戰國以前私人著作的資料。在這時期中，著作的觀念尚未形成。採用某人名義為書名的書，不一定完全是某人的著作；也許是他的門人所記述他的言論，也許是某一學派的學者，用其學派中最權威的人的名字為所著的書題名。流傳到今日的先秦著作，都多少曾經漢代學者刪定，我們很難確定在某一書中，那些是原著，那些是後人所增添。

諸侯間權力的紛爭，使他們爭聘著名文人、政客、和軍事家來為他們策劃。這些養士和食客的工作，便是讀書、討論、寫作、以及劃定謀畧。據說呂不韋在秦廷曾招致食客三千人，他們寫出各人的聞見，編成長達廿萬言包括各家學說的呂氏春秋。完成之後，陳列在國都城門上，懸賞千金，給能增減一字之人。這個故事，不僅告訴我們，在那時已有這麼一部完整而有系統的長篇鉅著；更告訴我們，那時能讀書寫作的人數已極為可觀。

戰國時，學者擁有自己平日用作教學和寫作的藏書，已是很普通的事。墨子說：「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他們周遊列國，也攜帶着書籍，以便途中應用。據說公元前四世紀時，詭辯學者惠施「行事多方，其書五車。」縱橫家蘇秦，在遊說秦惠王分化六國失敗後，曾搜遍他的藏書，最後找到一部兵書太公陰符之謀。精研此書之後，說服六國合縱，合抗強秦。正如古代希臘一樣，在中國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中，私人藏書是在官書檔庫建立之後，而在政府設立中央管制的藏書之前。

## (六) 焚書之禍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併六國，建立統一的帝國，封建時代乃告結束。雖然大帝國只延續了十五年，但這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統一，已給中國帶來了不少變化和深遠的影響。封建制度正式被廢棄，度量衡制度標準化，書寫的字體亦加統一簡化。為了增強統一，秦廷採取了一連串的管制方法；言論與思想的控制，只是其中之一。大量的古籍被燬棄，著名的「焚書」事件，便是這新王朝獨裁政策的一部份。



焚燬書籍作為思想控制的方法，並不始自秦始皇。先秦法家思想中早有此說。在李斯之前，商鞅為秦變法，「教秦孝公……燔詩書以明法令。」韓非子也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sup>13</sup>焚燬書籍的方法，也許早已為一些封建諸侯所採用；因為在孔子時代，已有文獻不足徵之感了。

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稱帝七年之後，丞相李斯建議：「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sup>14</sup>毫無疑問，很多圖書是被焚燬了，但這對古籍的損害，也許不如想像之甚。因這命令中，有很多種書籍是明白規定不在焚燬之列的。特別是秦史記和博士官所藏的書籍，以及醫、藥、卜、筮、種樹等實用書籍都加以保存。

有很多私人藏書，亦未被焚燬。同時，焚書令只嚴厲執行了一個很短的時間，當李斯在公元前二〇八年死後，焚書令的執行可能便鬆弛了。相信在公元前二〇六年，咸陽宮室的焚燬對古籍所造成的損害，遠超過秦代所謂焚書之禍。現在我們已沒有漢代以前的史料可以覆按，我們很難說，到底有多少書籍因政府的管制而亡佚，有多少因後來的災害而燬滅。

## (七) 古籍的整理

公元前二〇七年，農民革命將秦朝推翻，漢朝繼承一統。經過百餘年內修政治，外張武功，漢武帝時代便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最輝煌的朝代。嗣後，漢朝更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儒家思想擊敗了其他各派學說，而唯我獨尊。儒家學者，經過國學及考試而入仕政府。由於儒家的學術是基于古代的經典，因而儒家的勝利，便導致了古籍的復興。公元前一九一年，秦始皇所詔頒的「挾書令」被廢止。其後數十年間，儒家的古籍乃逐漸復出。

對古籍作有系統和廣泛的收集，直到漢武帝時方才開始。「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

<sup>13</sup> 韓非子卷四。

<sup>14</sup> 史記卷六。

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sup>15</sup>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sup>16</sup>政府派人四出搜尋存書，重賞徵借私人藏書，以便抄錄。以往，政府檔案的文獻，都由起草官書的機構保存。如今，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家中央圖書館建立起來，有系統的收藏和管理各種各類的書籍。

全國性的搜求藏書繼續着，收集之書，更加有系統的整理和考訂。公元前二六年，光祿大夫劉向和軍事專家、史官、及侍醫各一人，負責校訂經傳、諸子、詩賦、兵書、卜筮、醫藥等書。每書完成之後，劉向便將每書的篇目分別條列，更將內容摘要紀錄，上奏於朝廷。這些摘要便是後來的解題目錄之祖——別錄。劉向工作了十九年，終其一生，不曾完成這項校讎的工作。劉歆乃繼承父業。劉歆是一位著名的經學大師，他將當時所有藏書分為七類，編成第一個分類書目，稱為七畧。計有輯畧、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共七大類，其下更分卅八小類。劉向的別錄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國最早的解題書目；劉歆的七畧，則創造了中國目錄學上主題分類及著錄編目的制度。

這兩種目錄，如今都已散佚；但我們知道，劉歆的書目裏所收的書籍約六百種，共一萬三千篇卷。約在一世紀後，班固在他的漢書藝文志裏採用了這個書目。其中種數及篇數，亦大約相等。這些著述，大約有一百五十種或四份之一完整地或部份地保留至今，其中包括一些輯自其他資料的散佚書籍。雖然漢書藝文志裏所載的著述，現在大多已不存在，但是這些著述可顯示先秦和漢代的公家藏書之一斑。這書目裏的著述，更映出當時學術界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不僅政府在搜集書籍，私人也在收藏。皇族、官吏、以及學者對於藏書都頗有興趣。如河間王劉德、淮南王劉安，更懸重賞，並抄錄副本給那些願意出讓先秦著述的人，那怕只是斷篇殘簡，也加以收羅。著名學者蔡邕的個人藏書便有一萬餘卷。我們更知道，在公元前，中國已有書店。揚雄（公元前五三年——公元十八年）的方言裏曾述及「書肆」，書籍的買賣應當更早。據說，王充（約公元廿七年——一百年）幼年清貧，買不起書，只得在洛陽的書肆裏去瀏覽，想來那時的書籍仍是上層階級的專利品。

<sup>15</sup> 漢書卷三十。

<sup>16</sup> 太平御覽卷六一九。

有漢一代，文學、歷史等各種著述產量激增。儒家的石經和同時其他學者的傳註，成為當時及以後學者解釋經典的標準。更有許多哲學、科學，諸如天文、數學、植物學、醫學、農學、和工藝等等的著述，使得漢朝文化更加燦爛輝煌。

雖然書籍在大量生產和收集，但由於幾次政治擾攘，散失也不在少。公元元年王莽之亂，漢都淪於火海。東漢光武（約公元廿五年至五七年）復位之後，方再進行搜求古籍的工作。據說光武從長安遷都洛陽時，有二千輛載滿書籍的車輛隨行，至公元二世紀初，東漢的藏書已較前增加了三倍。但東漢末年董卓之亂，洛陽被燬，無數書籍復被掠奪、焚失。當公元一九〇年，又由洛陽遷都回長安時，很多用縑帛寫成的書籍，都被用作帳幕或囊袋。另外的書，不是被焚於洛陽，便是在裝載西運時，沉於河底。很多劫後殘存的書籍，更被燬於公元二〇八年的另一個新動亂裏。隋代的牛弘曾說，東漢二百年間，書籍的二次大毀滅，是中國書史上自古至隋的五厄之一。

#### （八） 宗教文學的盛行

自公元二二〇年漢亡，至公元五九〇年隋朝一統，政制分歧，戰禍連綿，加之西北邊界的外族入侵，實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期」。南朝諸代，中國學術文化幸能繼續繁衍。北朝有突厥、蒙古、西羌、鮮卑及匈奴各民族分據中原，相繼立國。但中國文化的延續並未斷絕，即使在北朝諸胡之國，中國語言文字，仍為日常生活的主要工具。知識份子仍然宗奉儒家學說；道家學說蛻變而為宗教；佛教於公元初世紀傳入中國，而盛行於此時。當諸胡入侵，政治不修，人們開始從這種遁世的新信仰中尋求慰藉。

佛教的傳入，不僅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事，即在學術發展及文化普及上，亦復影響不小。最初，佛教在學術界沒有重大影響，只在羣衆中流傳。由於宗教需要文學助其流傳，佛經乃陸續譯成中文。第一部佛經譯本出現於公元二世紀；公元三世紀時，譯本數量乃大形增加。僧人竺法護，譯經達一四九種。不僅北朝諸王皆皈依佛門，即在漢人的南朝，佛經亦成為皇家藏書的一部份。

隋朝（公元五八一至六一八年）統一後，佛教文學的產量到達了最高峯。佛經翻譯更受到鼓勵。公元五八一年，文帝令抄錄一切經，置於各大都邑之寺院，同時又別製抄本，藏於秘閣中。終文帝之治，計抄寫佛經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天下之

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sup>17</sup>

公元六〇六年，煬帝定鼎東都，下令設立一個專門的翻經館，更召聘專人負責其事。隋書經籍志包羅當時所有的重要文籍，除其主要四大部之外，並附錄佛、道二大類。其中計有道家經典三七七種，共一二一六卷；佛教經典一九五〇種，共六一九八卷。佛經在隋志中，總數幾達二分之一，卷數約佔六分之一。佛經在數量上之能與儒、道二家經典抗衡，實由於這時期中佛教的廣被，而佛經大量生產的需要，便成為刺激下一世紀發明印刷術的一種重要原動力。

<sup>17</sup> 隋書卷三五。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The Legacy of Ancient Chinese Written Records

(A Summary)

TSUEN-HSUIN TSIEN

History is a recollection of the past, transmitted from earlier times primarily through written testimony. In many respects, the Chinese have made ingenious and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ritten communication. Not only did printing originate in China, but many other significant devic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writing were initiated there even before this invention. Certain materials such as bamboo and silk were used for writing exclusively by the Chinese, and inscriptions on bones, bronze, and stone were much more extensive and refined than those in any other civilization. Paper, the most popular material for writing, was invented in China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and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odern age. The use of the soft brush and permanent ink, which made calligraphy an art, can be traced back to remote antiquity. Multiplication of writings through seal stamping and matrix molding, besides hand copying, was used many centuries before inked squeezing of inscriptions which was the forerunner of wood-block printing.

Continuity, universality, and productivity characterize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writing, which has created a distinguished and the largest homogeneous cultural group of mankind. For over a millennium,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commonly used for writing by many other peoples in Asia, even though they spoke differently. At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Chinese had produced more books than all other civilizations combined. Systematic book classification was introduced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and the standard fourfold 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third century has been used continuously till today. The development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arly Chinese records reflects the splendid state of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which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ne of the factors in producing a great number of written records in ancient China is the use of writ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pirits in sacrifice, offerings and prayers since the Sha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bureaucracy under the Chou encouraged the extensive use of documen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rchives in the royal court and various feudal states. Inter-state treaties, official records and other literature were produced and cared for by professional custodians who inherited this function. The documents under their custody were often removed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through rivalry for power of the feudal rulers. It was commo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for private scholars to produce and possess books since the feudal lords competed to employ scholars, statesmen, and military strategists to serve their interests. Teachings of numerous schools of thought as well as imaginative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were also committed to writing during this perio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fter the first unification of the empire in 221 B.C., much ancient literature was destroyed through censorship and wars. It has since become a tradition for the ruler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to attempt to recover lost works through systematic and large-scale search of past literatu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B.C., plans were made to restore the ancient books, and officers were appointed to transcribe and collate them for preservation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esta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Special catalogs well annotated and classified were compiled to recor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ooks were produced and accumulated on a large scale, but great losses were suffered during repeated calamities and disturba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political disunion and barbarian invasion of China from the 3rd to the 6th century when the empire was reunified,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not broken,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mained the common means of communication even in the north where barbarians ruled. During the turmoil, people began to seek solace in Buddhism. The massive demand for duplication of religious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ang dynasty motivated printing on a large scale. Thus, the multiplication of writings through the mechanical devices of printing was made possible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Chinese ideas and aspirations that has been carried forward as a literary legacy which is one of the richest and oldest in the worl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明太祖畫像（故宮藏明代帝后半身像冊）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